

邱雪玫 著

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

语义语法学研究系列

李葆嘉 主编

世界

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

邱雪玫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邱雪玫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 1

ISBN 978-7-5100-5405-1

I. ①汉… II. ①邱… III. ①汉语 - 句法结构 - 研究
IV. ①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3953 号

汉语话说结构句法学

著 者: 邱雪玫

责任编辑: 武传霞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和外文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1 mm × 1245 mm 1/24

印 张: 20

字 数: 433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405-1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语言科技文库》总序

李葆嘉

当代语言学已经进入了一个科学与技术的互补时代，信息处理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知识世界的载体是语符系统，信息处理的根本对象是语言信息处理。与计算机的出现使得语言符号有可能成为数据处理对象相似，神经科学实验仪器设备的应用，使得在大脑神经层面探讨语言机制成为可能。这些无疑都引导语言研究走向科技化，“语言科技新思维”（李葆嘉 2001）应运而生。所谓“语言科学”包括理论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等分支学科，所谓“语言技术”指语言研究的现代技术手段，包括语言信息处理、语音实验分析，以及语言的神经、心理和行为实验分析的技术手段等。就语言信息处理而言，又可以分为语料库研制技术、知识库研制技术、知识挖掘和抽取技术、句法信息处理技术、词汇信息处理技术、语音信息处理技术、语义信息处理技术、语用信息处理技术等。

2001 年 5 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创办了史无前例的“语言科学与技术系”，率先迈出了从传统文科教育范型向现代科技教育范型转变的步伐。“十五”期间，南京师大“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语言信息处理与分领域语言研究的现代化”（陈小荷教授主持），以基础平台建设、资源建设和理论探索等为主，迈出了语言科技研究的一大步。

“十一五”期间，南京师大文学院、外国语学院和国际文化教育学院联袂申报“211 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该项目以“语言科技”为引导，以“多学科交叉、跨院系整合、开放型营运”为理念，建设具有前瞻性、原创性、成长性的语言科技高级工作平台。以典型课题的工作原理为核心，进行资源开发和系统研制，拓展语

音科技、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言语能力受损儿童的语言能力研究等新方向。同时造就新一代学术领军人物和培养一批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以期形成一支高水平的交叉学科团队。该项目设计，体现了工作平台建设、理论创新、应用研究、人才培养、团队建设的学科发展一体化思路。其旨趣在于，加速语言研究从传统文科范型向现代科技范型的转变，以引领 21 世纪语言科技的新潮流。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项目，通过教育部组织的专家匿名评审，“语言科技创新及工作平台建设”（2008 ~ 2011）获批，总投入 1000 万元。总体而言，这一“语言科技创新”团队，分支学科齐全，专业知识互补。涵盖了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义科技、语音科技、实验方言学、历史语言学、神经语言学、二语习得研究、话语行为语言学等领域。这一期间，项目组成员获批的国家级基金项目达 20 多项。该项目理念之前瞻、实力之雄厚、工程之浩大、经费之保障，为学界瞩目。

2008 年秋，本项目以南京师范大学语言科技研究所为实施单位正式启动。主要有三大任务：建设一个领先性的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立一个独创性的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撰著一套有特色的语言科技文库。

从实验室方案设计到设备招标采购，再到实验室用房改造，经过 8 个月的努力，2009 年 12 月，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建成，为语言研究从传统范型向科技范型的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该实验室划分为实验工作区、科研工作区和管理服务区。实验工作区建有语音实验与计算室、神经认知实验与计算室、课堂话语实录室三个专门实验室。科研工作区建有语义科技工作室、语音科技工作室、方言实验工作室、知识工程工作室 I（先秦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中古词汇）、知识工程工作室 III（敦煌俗语言文字）、语言习得神经机制工作室、语言习得中介机制工作室，以及参研工作室。管理区服务包括办公室、管理室、编辑室和交流室。出席“语言科技高层论坛暨语言信息科技实验室落成仪式”（2009 年 12 月 14 日）的专家认为，该实验室体现了语言学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性和先进性，具有整体性、科技型、开放型三个特点，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是“语言科技新思维”的又一体现。同时认为，该实验室的科研工作涵

盖了四个二级学科、四个博士学位点，有稳定明确的研究方向，有合理的设计规划和很好的科研基础；整体设计合理，功能齐备。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标准衡量，很多方面超过了指标。

语言科技工作平台是基于工作原理（课题定位—理论方法—技术路线—关键技术—评估方式）而建设的高级平台。一方面，从语言信息、语言知识和语言机制三个层面，围绕典型课题进行设备配置、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一方面，将典型课题研究与工作平台建设融为一体，依据典型课题建设的子平台应具有解决同类课题的功能。

建设语言科技工作平台的目标是要实现语言研究手段的技术化和模型化，总体设计包括三个二级平台和八个子系统。

一、语言信息工作平台 1. 语义科技工作系统（李葆嘉教授主持）：基于词汇语义—句法语义的一体化研究思路，开发“人—机交互语义标注工具”，研制“深度语义标注信息库”；研制“幼儿（2~6）日常话语跟踪语料库”，完成幼儿语义系统和话语行为分析研究。2. 语音科技工作系统（顾文涛教授主持）：研制“多语言、多语境、多语用的语音语料库”，基于声学信号分析、感知实验和数学建模，完善语音韵律理论与相关技术应用。3. 方言实验工作系统（刘俐李教授主持）：完成“网络版汉语方言有声语料库”，拟定系统的可操作性语音、词汇、语法实验模型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新兴交叉学科“实验方言学”。

二、语言知识工作平台 1. 先秦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陈小荷教授主持）：研制“先秦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先秦文献自动分词算法、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算法、同指专名检索软件工具等，完成“先秦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2. 中古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系统（董志翘教授主持）：研制“中古文献语料库”、“专名知识库”、“中古汉语词汇档案库”等，开发中古文献自动分词和标注工具等，完成“中古汉语词汇统计与知识检索”。3. 敦煌俗语言文字统计与检索系统（黄征教授主持）：研制“敦煌文献资料库”、“敦煌文献俗词语档案库”，开发相应工具，完成“敦煌文献资料与知识检索”。

三、语言机制工作平台 1. 二语习得的神经机制研究系统（倪

传斌教授主持): 研制“英语受蚀词汇库”等, 基于行为学、脑成像和脑电三维度模型, 进行中国人英语习得与磨蚀的神经机制研究, 完成“基于神经机制的英语个性化学习分析系统”。2. 二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系统(肖奚强教授主持): 研制“留学生汉语口语中介语语料库”, 基于中介语理论、对比分析理论、偏误分析理论以及二语习得影响因素等, 完成“留学生汉语习得的中介机制研究”。

这一工作平台, 既是科技研究平台, 也是人才培养平台, 即一个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体系。

作为本项目的文本成果,《语言科技文库》包括计算语言学研究、语义语法学研究、汉语方言学研究、古代汉语学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新专题研究六个系列。其总体特征为: 领域的开拓性、理论的原创性、选题的新颖性、方法的交叉性、考据的精审性、成果的应用性。在研究过程中, 除了数据采集分析、资源建设和软件开发, 更重要的还是要有新思路、新理论和新材料。陈小荷提出的先秦文献信息处理新方法, 从先秦典籍注疏文献中挖掘出用于自动分词和词义消歧的知识, 再注入已开发的古汉语分词和词性标注工具中去, 所取得的首秦古籍版本异文自动发现、先秦词汇知识自动挖掘等成果均具开拓性。李葆嘉提出的语义语法学理论和话语行为理论, 基于研制专用语料库或语义信息库和技术手段, 开拓了语义网络建构、深度语义分析和话语行为研究等新的领域。刘俐李建构的实验方言学理论和方法, 为方言学向现代科技方法的转型研究提供了新路, 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黄征多年来从事敦煌文献及其俗语文字研究, 古代汉语学研究系列中的敦煌文献校录整理, 以及敦煌写本字词考释、以古佚和疑伪经为中心的敦煌佛典词语和俗字研究、两汉声母系统研究等新见迭出。肖奚强基于汉语中介语语料库的二语习得研究, 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界已经产生了影响。钱玉莲的汉语介词与相应英语形式比较研究等专著各有亮色。倪传斌依据语言测试和认知实验等数据, 从行为学、生理学和语言学三个层面分析影响中国英语学习者外语磨蚀的相关因素。刘宇红基于隐喻的理论探讨, 对各类隐喻形式的结构、特性和解读规律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探讨。

《语言科技文库》所收论著, 由作者在 2008 年 12 月申报选题,

2011 年始逐步完稿。系列主编审读了书稿，主要就其学术价值、章节安排、内容关联、行文表述、图表绘制等方面，提出审阅意见。此后，作者们对书稿又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语言科技文库》的作者，大多数是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对于我们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走进语言学研究领域的而言，出版论著可能已不足为道。然而，对于年轻学者而言，其论著的出版既是几年来研究的结晶，也是对其继续探索的促进。换言之，“211 工程”重点学科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年轻教师搭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科研和教学平台。学科带头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提携后进。

尽管从根本上来说，科学或学术研究是一种个人的探索行为，然而复杂问题的研究，无疑需要群体协作。“学科建设”或团队合作模式，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个新概念。这种模式涉及总体规划、多方协调，是需要付出精力和心血的。2008 年，通过投票方式推举我担任该项目总负责时，就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个“劳动班委”。2009 年，前往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时，曾谈到“学科负责人的任务就是规划设计，争取项目经费和提供科研设备设施”，得到黄教授的赞许。2010 年，申报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时，评审专家柳士镇教授提问的“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项目，各学科之间的协调是怎么考虑的，有什么做法”，可谓一语中的。作为后学，深知交叉研究之艰、学科整合之难。相关学科之间的整合协调需要借助行政机制，但凭借行政方式并非就能完成。当时的回答是，目前做到的是建成了一个可以合作研究的场所，至于学科之间的进一步沟通合作应有较长过程。有一点很明确，只有通过交叉项目，相应学科才能渗透，合作者才能逐步磨合。我们只是在一步步探索。

十一五期间的“211 工程”建设项目即将完成，但是学科建设的任务并没有结束。2010 年，“语言信息科技研究中心”被评审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为“语言科技”这一交叉领域注入了新的建设活力。重点研究基地建设，除了“跨院系整合、多学科交叉、开放型运行”理念，需要凸显“合作性攻关”。围绕交叉性项目，实施计算语言学、语音科技、神经语言学、语义科技等力量的联合攻关计划。只有通过全面开放以及和与国内外同

行的合作交流，才有望建成具有影响的语言科技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

十年前，我（2001）曾写道：“语言科技”的内涵是以理论研究为指导，以描写研究为基础，以应用研究为枢纽，促使语言研究向计算机应用、认知科学和现代教育技术领域等延伸，沟通文理工相关学科以实现语言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的技术化。“语言科技”的外延为语言工程科技、语言教育科技和语言研究科技。其中，“语言研究科技”是将语言研究活动与资源建设、软件开发相结合，其目标是实现语言学自身的科技化。还应包含语言实验、数据处理这些实验语音学、神经语言学研究的科技手段。

虽然语言学家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转向语言计算或实验研究，尽管描写、考据和内省始终是最基本的方法，但是具有一定的语言科技意识却非常必要。语言学家只有了解有哪些可供利用的资源、软件或仪器，才能提高其研究深度、精度和效率。语言学家也只有了解到信息处理的语言研究需求，才有可能为之提供可资应用或参考的基础成果。“语言科技”是 21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潮流。

此为出版缘起。是为总序。

2011 年 8 月谨识于南都

李 序

只有哥伦布才能发现新大陆，而郑和只能七下西洋。因为哥伦布没有沿着旧地图……

如果一部研究话语结构的论著，不纠结于主语和话题的关系，不满足于复指、移位、悬置式的话题分类，不在话题的移位说与生成说中兜圈子，不囿于传统句子成分分析法，而是基于话语行为的表达，将目光聚焦于话题语—说明语之间的匹配关系，抽象出一套话说结构的功能范畴系统，这部论著无疑是一部原创性的句法学专著。

一

2008 年秋，邱雪玫来到南京师大国教院，师从段业辉教授攻读对外汉语专业博士学位。段教授原来一直担任文学院语言学专业的博导，我们的学生都是相互听课。国教院设置对外汉语专业博点以后，段教授仍要求其博士生如此。2008—2009 年度，皇甫素飞和邱雪玫选修了我开设的“中国转型语法学”、“语义语法学导论”等课程。作为徐师大的忘年校友，邱雪玫的好学深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9 年 12 月的那次博士论文开题报告会，文学院的语言学专业和国教院的对外汉语专业的 4 位博士生是一起举办的。邱雪玫的选题报告《汉语名词性词语受事话题句研究》，长达 45 页，近 4 万字。博士论文的字数要求 8 万字，而该选题报告已达一半。参考文献就列出了 200 多种。浏览一过，有龚千炎的《现代汉语里的受事主语句》（1980）、曹秀玲的《V 前受事结构的功能及其表现形式》（1997）、程丽霞的《左偏置结构频率统计与话题结构的显现》（2006）等期刊论文；再细看看，还有张云秋的《现代汉语受事宾语

句研究》(2001, 2004 出版)、白栗薇的《受事主语句中的几个问题》(2004)、彭锦维的《现代汉语受事前置句研究》(2005)、宋金花的《受事主语句的句法语义研究》(2006)、刁世兰的《受事成分的句法投射》(2007)、齐建涛的《从“三个平面”语法理论看现代汉语受事主语句》(2007)、袁芳的《现代汉语无标记受事主语句释析》(2008)等近年来的学位论文,不由得为之一惊。按照通行的思路研究“受事话题句”,难逃“炒冷饭”啊!我当时的建议是,要梳理学术沿革,要基于汉语语感,要提出新的思路,只有根据实际研究进展调整论文题目。

尽管我自己的信条是“疑则思,思则究,究则知”(1984),但不能这样要求学生。我曾经说过,学位论文选题要“不多不少、不难不易、不大不小、不中不西、不新不旧”。文献太多,所忧无从置喙;文献太少,所思腹中空空。选题太难,时有浅尝辄止;选题太易,流于敷衍了事。工作量太大,不能如期完成;工作量太小,难免偷工减料。仅有中国理论,显得孤陋寡闻;只用西方理论,势必削足适履。结论新颖,学界接受不了;结论陈旧,盲审通过不了。总之,创新之处要适度,冲击力度要控制。否则,轻则不置可否,重则遭遇非议。

然而经过两年探索,邱雪玫的博士论文却打破了五个“不偏不倚”。话题研究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名家名作。梳理文献就用了半年时间,撰写了5万多字的述评,发现了大量雷同,这才另辟蹊径。话说结构的研究可谓尖端,难度太大。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工作繁重。力求建构基于汉语事实的理论方法,可谓跳出“跟着转”。至于质疑陈说,独特新见,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五个“不偏不倚”奉行中庸之道,也是基于史无前例的学术国情。尽管“创新”口号满天飞,实际“天下文章一大抄”。学术创新,并非想做就能做到。这需要学术胆识,而胆识是天生的。窃以为,质疑能力与创新能力,植根于世代相传的遗传基因,激发于自由自在的成长环境,张扬于多元宽容的学术生态。

从建构语义语法学理论（2001），到提出“人工语言脑”的语言基因图谱分析工程、认知语义网络建构工程、受限语言能力模拟工程（2003），再到话语行为的四效能说（2004、2006），话语行为模式、话语表达结构与话语行为效能，一直是我关注的领域。

“话题问题”的探讨最早可追溯到法国古典学者维尔（H. Weil, 1844）的观点。他认为，每句话都包含“说话的起始”和“说话的目的”，即提出了与句子成分分析法（基于形态与逻辑的）不同的话语句的二分理念（基于说话人的思考和句子语序的）。

通过学术史的追溯，厘清“汉语话说结构”研究的渊源，难免会感受到接二连三的历史遗憾，可谓喜忧参半。

第一个面对汉语事实，提出“指称—陈述”结构说和“心理主语（话题语）—心理谓语（说明语）”概念的，是德国学者甲柏连孜（H. G. von der Gabelentz, 1881）。作为第一位研究汉语话说结构的西洋汉语文法学家，甲柏连孜可谓独具慧眼。一方面，他彻底砸碎了“拉丁文法的普罗克鲁斯特之床”；一方面，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流行民族心理学说。当然，甲柏连孜还提出，语法体现了逻辑（语义）、心理（语用）、时空（序列）三方面的关系，可谓三个平面理论的创始者。遗憾的是，《马氏文通》（1898）接受的是西洋汉语文法学的第二代理论（罗曼式汉语文法学）的影响，而无缘以第三代理论（日耳曼式汉语文法学）为起点。（李葆嘉，2008）

然而，面对古代汉语文献语料，马建忠已悟到，“冠名”、“冒起”的“若起词”，以及“前置之名”之例为“华文所独”，与“西文已有之规矩”有别。可以认为，《马氏文通》的起词—止词之分，从某种程度上相当于“说话的起始”和“说话的目的”。

为挣脱模仿西方的主谓框架，陈承泽（1922）提出了“标语（主部）—说明语（说明部）”的汉语句子分析框架。遗憾的是，在纳氏文法（J. C. Nesfield, 1891）和里特分析法（A. Reed, 1899）的“新潮”（黎锦熙语，1924）中，在“矫正模仿之弊端、倡导独立之新风”（陈望道语，1938）的文法革新讨论中，在三品说“拿来就

用”(吕叔湘语,1942)的心态中,“标语—说明语”框架也就被历史所尘封。

在洪心衡(1956)论述“空间词做主语的问题”时,中国学者的汉语语法学论著中才首次出现了“话题”这一用语。遗憾的是,在主谓结构天经地义的年代,该研究同样没有得到重视。

1959年,精通汉语的美国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霍凯特(C. F. Hockett)讨论了汉语和英语中的话说结构,“话题—说明”这对概念进入后布龙菲尔德学派的视野,由此重新引发了汉语话说结构的研究。1968年,旅居美国的赵元任受此影响,提出汉语中的主语—谓语的语法意义是话题—说明的关系,而不是施事—动作的语法关系。遗憾的是,赵元任的“汉语结构话—说论”,敌不过大陆的“汉语结构主—谓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结构主义的衰退、形式主义的困顿和功能主义的崛起,对话题研究的关注在美国渐成热点。1976年,李讷和汤姆森(Li Charles N. & S. A. Thompson)基于话题是否凸显,提出一种新的语言类型划分法,认为汉语属于话题凸显型语言。而留学美国的台湾学者曹逢甫,则在把赵元任的语法描写方法用到话语分析中感到失望后,促使其在汉语话语中寻找基本功能单位,由此提出了话题链理论(曹逢甫,1979)。遗憾的是,李讷和汤姆森的观点,被大陆语法学家认为“看不出什么价值”,“这种做法从原则上说就是错误的”,“一个语言成分算不算话题,可以引起无穷的争论”(朱德熙,1985)。

印尼华人学者刘宏谟(1977)的汉语引—申框架理论表明,作为一种语言结构的存在,汉语的话说结构,只要基于汉语语感就能发现。反而是套用所谓“普遍语法”或“现代理论”,掩盖或扭曲了汉语句子组构的真相。遗憾的是,《刘氏语通》在80年代初的大陆汉语学界,遭遇到的更多是冷漠和不解。

尽管在徐州师院中文系读研期间,廖序东先生就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刘氏语通》(川师成大《汉字改革报》编辑部,1983年排印本)。可是那时对汉语语法学史相当无知,粗粗翻阅《刘氏语通》,只知马氏之外亦有刘氏、“文通”之外尚有“语通”,并没有意识到其真价值。直到1997年始撰写《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

与汉语类型的沉思》，2001年后关注话语表达结构与话语行为效能，再次翻阅《刘氏语通》，才认识到其中关于话语结构分析的新见。

稍后，指导越南研究生范德忠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刘氏语通〉研究》（2009）。坚持传统语法“主流”立场的，势必对《刘氏语通》在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价值持质疑态度。理由一般有两条：一条是对外汉语教学一直都是依据传统语法体系编写教材，进行教学与研究；一条是《刘氏语通》语法体系的使用范围，不可能与大陆的传统语法教学范围比较，没有什么影响。而我以为，从来没有什么“主流”，有的只是“随大流”。正常的学术生态是多元互补，而不是一言堂。号称主流的、随大流的、反潮流的、当潜流的、预示未来潮流的等等，都应当有生存空间。而学术史的评价，主要根据研究者论著的内容，揭示其比前人提供了什么创见。有人排斥或者不知，不等于某论著在学术史上就没有相应地位。

三

尽管李讷和汤姆森的观点被认为“看不出什么价值”，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汉语“话题问题”仍然一跃成为汉语语法学界的关注热点。话题和主语关系的讨论，在汉语学界受关注程度之高、讨论时间之长，都是以往难以比拟的，其分歧之严重也同样如此。

关于汉语话题的地位，主要有四种观点：以赵元任（1968）为代表的“汉语句法结构话一说论”，以朱德熙（1982、1985）为代表的“汉语句法结构主一谓论”，以胡裕树、范晓（1985）为代表的“汉语话题语用平面成分论”，以李讷、汤姆森（1981）及徐烈炯、刘丹青（1998）为代表的“汉语句法层面主、话并存论”。从学术背景来看，“话题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八种视角：1. 基于三个平面理论；2. 基于结构语法背景；3. 基于形式语法背景；4. 基于汉语类型特点；5. 基于功能背景；6. 基于信息结构背景；7. 基于结构一功能背景；8. 基于认知背景。

面对如此众多的文献，令人不得不思考，汉语“话题问题”的研究是已经基本完成，还是依然是一个疑难杂症呢？

通过文献研读可以发现,以往的“话题问题”研究主要存在六个问题。第一,对话说结构研究的学术沿革没有系统梳理,只是将“话题”这个术语“拿来就用”。常常引用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几篇文献。可谓“数典忘祖”。第二,“话题”尚未有一个确切定义,关于话题的性质、特征、功能众说纷纭,甚至针锋相对。有的列举的“话题”特征、性质多达十几条,“话题”的属性在多种理论背景的解说中而失其本真。可谓“概念爆炸”。第三,主要精力纠结于话题语和主语的关系,或话题语的单方面分类,而话题语与说明语之间的观照研究鲜有问津。可谓“喧宾夺主”。第四,尽管大多数学者认为,话说结构和主谓结构是句子中的两种基本结构,但是未见就汉语中的句型逐一鉴别,厘清两种基本结构的界限。可谓“泾渭未明”。第五,满足于几条道理一串例子,无人基于真实文本,对汉语话说结构进行定量统计分析。可谓“一叶障目”。第六,没有新的思路,研究汉语话题的若干论文中存在雷同,复制量从几百字到6000字不等。可谓“移花接木”。由此可见,“话题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疑难杂症,汉语话说结构的研究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

当然,要讨论话说结构,首先务必认清以下基本事实:1. 具有形态变化的屈折语,遣词造句存在形态变化的一致性,由此在话语表达层面形成了主谓结构,个别的话说结构则成为“非正常语序”。主谓结构分析,适合于屈折语中“正常语序”的句子。2. 不采用形态变化的汉语,遣词造句凭借语境和语用策略的情景性,由此在话语表达层面形成了话说结构。虽然也存在一些基于施—动语义关系的“主谓结构”,但是大多数句子属于话说结构。3. 因此,屈折语句法以主谓结构为研究重点,而汉语句法应以话说结构为研究重点。一些明智的西方语言学家早已认识到这种差别,从而提出汉语话说结构的学说。即使并非“现代语言学家”,只要基于日常语感或语言教学实践,也可能自发提出汉语话说结构的学说。

其次,需要进一步加以思考的相关问题是:

1. 欧洲传统语法学,何时开始采用“主语—谓语(动词+宾语)”句法范畴来分析屈折语的句子?在没有出现这对句法范畴之前,屈折语是如何分析句子结构的?

作为西方屈折语法学的原典,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 前2

~前1世纪之间)的《读写技艺》(*Téchnē Grámmatiké*)定义了希腊语的两级语法单位,其研究重在形态类比规则。瓦罗(M. T. Varro, 前116—前27)的《拉丁语研究》(*De Lin-gua Latin*)除了着重研究词类划分及其形态变化,句法研究主要分析了主动态和被动态等。狄斯科鲁斯(A. Dyscolus, 2世纪)的《论句法》(*Peri Syntakseos*),首次在名词和动词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他词类与名词和动词关系的基础上,初步搭建了希腊语的句法描写框架,区分了主语—动词、动词—间接格这些结构。描写句法关系的依据,一是名词的格变,一是动词的及物与不及物、主动与被动的变化形式。因此,欧洲的古典句子分析法可称之为“形态范畴分析法”。

早期的西欧语法学家关注的是句子的形态范畴,而哲学家关注的是命题的逻辑范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前384—前322)指出,一个命题可分析为一对词项:“主词”是表思想对象的词,“谓词”是表对象性质的词。因此,欧洲的古典命题分析法可称之为“主词—谓词分析法”。直到12世纪,法国学者阿伯拉尔(P. Abelard, 1079—1144)才在《逻辑导论》(*Logica Ingredientibus*, 1121)中,提出了“主词—联词—谓词”的命题三分法。

与之相应,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所创立的思辨语法(*Grammatica Speculativa*),强调语法研究中最重要应当是句法。由此,摩迪斯泰学派(*Modistae*)将“主词—谓词”引入句法分析,第一次在句法层面提出了“主语(*suppositum*)—谓语(*appositum*)”这对句法范畴,形成了屈折语的主谓结构理论。中世纪后期的语法学家开始运用词序来判断句子成分,认为罗曼语的语序“名(主)—动—名(宾)”才是普遍语序,而不是拉丁语的“名(主)—名(宾)—动”。

尽管如此,直到19世纪中叶,句法分析才得到欧洲学者的进一步关注。1847年,克劳克(Stephen W. Clork)在《实用语法》中提出了句子结构图解法。19世纪末,将句法研究推到凸显地位的,主要有纳斯菲尔德(J. C. Nesfield, 1891)、斯威特(H. Sweet, 1892)、里特和克劳格(A. Reed & B. Kellogg, 1899)的英文文法体系。章士钊的《中等国文典》(1907)已参考纳氏四分法分析汉语的句子。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参考纳氏文法、里特和克劳格

的分析法，将汉语的句子成分确定为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附加语、副词性附加语六种。此后，句子成分分析法才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推广开来。

2. 汉语借用的“主语”和“谓语（动词+宾语）”，与屈折语法学中的 Subject 和 Predicate (Verb + Object) 有没有本质差别？

西方语法理论基于逻辑概念形成的主—谓句法范畴，是13世纪那些瞧不起传统拉丁语语法学家的经院哲学家的思辨产物。既然主谓框架在形态语言的句法分析中已经沿用了700年，自有其合理性。同样，既然主谓范畴基于形态变化的一致性，也就难免存在其局限性。认清了“主谓结构”的由来及其性质，也就可能认识到西洋式主谓结构的自恰性和汉语式主谓结构的比附性。

语义型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在汉语的句法层面认定主语必然遭遇麻烦。自马建忠（1898）引进西方语法框架以来，汉语语法研究长期处在主语、宾语与汉语句子结构分析的困惑之中，尤其是对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曾经提出过的冠名、外位、倒装、游离、复指等成分，一直未能给出其自身的句法范畴地位。

何容（1942）认识到，西方语法的“主语”、“谓语”这些术语有其形态变化的语言基础，而在汉语语法中没有与之相应的“类”及其标记。汉语语法学不仅不能套用西洋语法框架，而且也不应当照搬这些外来术语。为此，专门引用了塞斯（A. H. Sayce）在《大英百科全书》grammar 条目中的一段话：

（否则）中国语言的文法永远不会弄明白，除非我们不但要把欧洲语言的文法术语弃掉，而且连这一套术语所代表的概念也弃掉。（《中国文法论》，28页）

由于套用和照搬，在形态语言中有明确界定的“主语”和“谓语”，到汉语中却成了无法严格定义的句子成分。囿于主谓结构理论，朱德熙（1985）只能如此感慨：“目前还没有人能够给主谓结构、述宾结构等等基本语法概念下严格的定义。”（《语法答问》，30页）基本概念都无法严格定义，只能说明这个概念本身有问题。面对汉语的主语“这一使人头疼的问题”，李临定（1985）只得主张要抓汉语句法中的施受关系。要消解“头疼的问题”，只有找出病